

百年鄭和研究（1905-2005）

時 平*

本文對鄭和研究近百年來的發展進行了概要性的總結及評述。依據鄭和研究的時代特徵和鄭和研究的學術發展特點，將百年鄭和研究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以及開拓、專題研究、拓寬和深入發展、全面發展、創新和高潮五個時期，分析和論述百年研究進程中形成的主要特點，將鄭和研究涉及的內容分為鄭和下西洋史實、鄭和航海與航海技術、相關人物及遺蹟、鄭和研究學術史、鄭和下西洋與現實關係等五個方面，並歸納介紹鄭和研究中主要爭鳴的問題及不同觀點。筆者認為鄭和研究要結合新世紀的時代特徵，重視鄭和文化價值的研究，從文化交流的互動性探討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而且鄭和研究應多研究其結果及作用，不必過分探討其動機，應多採取求同存異的研究方法。

鄭和作為中國歷史上對外交往的一位傑出人物、一位偉大航海家、一位和平友好使者，是值得後人尊敬的；鄭和下西洋作為世界航海史的偉大壯舉、人類文明進程中一個重要成果，也是值得後人紀念的。研究和紀念鄭和最熱烈的時代是我們剛剛經歷的這一百年，從1905年中國近代維新思想家梁啟超發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到2005年中國政府隆重紀念鄭和下西洋首航600週年。這百年歷程是中國社會變革最劇烈、最深刻的關鍵時刻和轉折時期，鄭和研究彰顯了鮮明的時代特徵和蓬勃的生命力。在紀念鄭和下西洋600週年之際，回顧和總結百年鄭和研究的歷史，探索其發展規律及特點，對繼往開來推動新世紀鄭和研究事業是有重要意義的。

鄭和研究的百年歷程

從1905-2005年，鄭和研究歷經百年的發展歷程。近二十年來學術界曾對鄭和研究的發展進行過回顧和總結，其中以黃慧珍、薛金度《鄭和研究八十年》、時平《近百年的鄭和研究》、范金民《20世

紀的鄭和下西洋研究》等為代表⁽¹⁾，他（她）們依據中國社會的歷史變化和鄭和研究發展中的重要事件，對鄭和研究的歷史進行階段劃分和綜述，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本文考察鄭和研究百年發展道路，依據鄭和研究的時代特徵和鄭和研究學術發展特點，將百年鄭和研究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1905-1984）是近當代鄭和研究開端、逐步展開和發展階段，作為歷史領域的專題研究，形成了三個發展時期：

一、開拓時期（1905-1934）

以1905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為標誌，肇啟了20世紀中國鄭和研究的序幕。三十年間，根據有關資料統計，海內外先後發表了三十多篇論文、四部書籍，還有一些涉及鄭和的論著。⁽²⁾這一時期，學者主要以現存的文獻資料為依據，研究重點放在鄭和七次下西洋的時間、所歷國家、記載鄭和的主要文獻以及一些史跡的考證。其中涉及鄭和與南洋較多，由於受到文獻資料限制和其它方面的制約，研究尚不夠全面和深入。然而這些開創性的研究，為以後鄭和研究奠定了基礎。

*時平，上海海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長、教授，中國紀念鄭和下西洋600週年領導小組籌備辦公室顧問。

這一時期鄭和研究的代表性著述有梁啟超的〈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向達〈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馮承鈞《鄭和下西洋考》序和《瀛涯勝覽》序、夏璧〈鄭和七使西洋往返年月及其所經諸國〉等。梁啟超所著〈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使20世紀鄭和研究有一個好的開端，對以後的鄭和研究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它主要體現了三個特點：一是以史為鑒，具有服務社會需要的鮮明時代特徵。梁啟超目睹祖國面臨瓜分國弱民窮的形勢，欲以鄭

和下西洋創造的偉大壯舉，振奮民族精神，喚起國民的愛國熱情；二是首倡中西航海比較研究。他從比較入手，將鄭和與西方的亨利、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航海進行比較，肯定了鄭和下西洋的歷史地位，率先提出鄭和是中國“偉大的航海家”；三是繼承並堅持中國治史的傳統，考證了鄭和下西洋所到各國地名三十九處，配以西文對照，對30-40年代的鄭和研究產生了積極影響。梁啟超把歷史與現實、政治與學術有機結合起來，從輝煌而典型的歷史之中發揮新史學啟迪“國民意識”的功能，從歷史的腳步中奏響了時代的愛國主義強音。

1912年，袁嘉谷發現馬哈只墓和〈故馬公墓誌銘〉，所著〈昆陽馬哈只碑跋〉使人們對鄭和的身



明成祖朱棣像

世、祖先、故里等情況有了進一步瞭解。向達〈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一文從中西文化交往演變進程、地理學認知角度審視鄭和下西洋的作用，搜集、整理了當時的文獻資料和研究成果，對鄭和家世及其貢獻、研究的資料、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等進行了分析和評述，還對多種重要文獻進行考證和評價，為此後的鄭和研究打下文獻資料的重要基礎。

這一時期，學者主要以現存的文獻資料為依據，研究重點放在鄭和七次下西洋的年月、鄭和身世以及鄭和史蹟的幾種文

獻資料考證、校註。由於受到文獻資料等方面的限制，對鄭和研究尚不夠全面和深入。

二、專題研究時期（1935-1949）

30年代中期學術界開始對鄭和及其航海進行專題研究，研究學者增多，陸續發現了新的鄭和研究史料，並對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性質、航海、造船、家世等問題展開深入探討，出版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海內外共發表了論文八十多篇，著作二十餘部，形成了鄭和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新史料的發現是學術界重視鄭和研究的結果，促進了專題研究局面的形成。1935-1936年先後發現了南京靜海寺永樂十四年四月初六日的〈御製弘仁普濟天妃宮之碑〉、太倉劉家港宣德六年歲次辛

亥春朔的〈通番事蹟之記碑〉、長樂宣德六年歲次辛亥仲冬吉日〈天妃靈應之記碑〉和雲南玉溪《鄭和家譜》。把文獻記載和實物資料結合起來，成為研究的新方法，使鄭和研究更加準確和科學。“這是鄭和研究史上的一個轉捩點”⁽³⁾。這些研究糾正了七次下西洋的年月，搞清了永樂二十二年出使情況，糾正了文獻記載混亂之處等。

關於鄭和下西洋目的和性質的討論，是鄭和研究開始引向深入的表現。1936年吳晗在《清華學報》發表〈16世紀前之中國與南洋〉一文，引發了持續一年多的學術討論。雙方都以文獻資料為依據，吳晗、童書業等認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經濟目的，試圖通過經營國際貿易來解決國內經濟困難。許道齡、李晉華等認為鄭和下西洋目的是蹤跡建文、宣揚國威。雙方在學術上的爭鳴，開創了鄭和研究學術討論風氣。

關於寶船和航海技術的研究。40年代，學術界開始專門研究鄭和船舶和航海技術。其中管勁丞〈鄭和下西洋的船〉對《明史》記載寶船的尺寸、長寬比和船型提出質疑，根據發現的南京靜海寺殘碑、李昭祥《龍江船廠志》記載，認為鄭和所乘寶船“係二千料海船”⁽⁴⁾，開啟學術界鄭和寶船之爭。范文濤、李長傳、張禮千等對《鄭和航海圖》、牽星術、針路進行研究。范文濤認為鄭和航海圖約在1525-1575年間繪成，“鄭和航海時所用之原圖，則已難稽考”⁽⁵⁾，對航海圖中馬來半島等地區的地名進行考證，對若干針路中的術語做了註釋。張禮千的研究，東自菲律賓、越南、印尼、馬來半島，西到印度等地，範圍超過了范文濤。兩書綜合起來基本上搞清了鄭和下西洋和《鄭和航海圖》中有關的地域。

關於鄭和家世研究。由於1935年雲南玉溪《鄭和家譜》的重要發現，記載了有關鄭和世系、出使事蹟、船隊等內容。李士厚據此進行考證，1937年出版《鄭和家譜考釋》，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學術價值。

這一時期學者們還對鄭和與南洋、天妃的關係和明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展開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出版了鄭鶴聲《鄭和遺事彙編》、束世澂《鄭和南征記》等幾部比較全面介

紹和研究鄭和及其下西洋的著作，體現了這一時期鄭和研究的水準。

三、拓寬和深入時期（1950-1984）

這一時期的鄭和研究領域逐步拓寬和深化，學術界重視對鄭和研究史料進行整理和考證，研究涉及鄭和下西洋的政治、經濟、文化及歷史作用，鄭和下西洋與亞、非洲及臺灣的關係，鄭和寶船和航海技術等，重視鄭和遺蹟的考證，自然科學研究進入鄭和研究領域。海內外先後發表學術論文、文章四百多篇，出版研究著作四十多部。

關於鄭和研究史料的收集和整理。1950年前曾出版過《星槎勝覽》等一些文獻資料。50-60年代，陸續整理出版了馮承鈞、向達校注的《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瀛涯勝覽》、《鄭和航海圖》、《兩種海道針經》等較系統的鄭和研究史料。80年代初出版了鄭鶴聲、鄭一鈞收集整理和系統分類的《鄭和下西洋資料彙編》（上中冊）一百六十多萬字。⁽⁶⁾此外，一些中外關係史料、國別史料、地方誌史料的整理出版，也從不同的角度為鄭和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這些文獻資料的整理和出版，不僅使研究鄭和的資料系統化，而且增加了新的史料，為全面深入的研究鄭和提供了堅實的文獻資料基礎。

自50年代中葉開始，學術界重視對鄭和下西洋中外關係問題的研究。從當時的研究著述看，研究的國家涉及印尼、菲律賓、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汶萊、泰國、印度、斯里蘭卡、孟加拉、馬爾代夫、澳洲及西亞、東非諸國。它們從不同角度研究與這些國家之間的友好往來、經濟文化的交流等。也有學者依據發現的史料提出鄭和曾於“永樂二年出使日本”⁽⁷⁾、可能到達澳洲的觀點，拓寬了鄭和研究的領域。同時，臺灣學者開始重視鄭和下西洋與臺灣關係的研究，內容多屬考證性著述。

這一時期學術界深化鄭和研究領域中一些問題的研究。繼30-40代關於鄭和下西洋目的的學術爭論，50-60年代又展開了學術爭鳴。有學者認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針對中亞蒙古帖木兒帝國對明朝西北的威脅；有的認為是明朝政府積極推行“朝貢貿易”和“齎賜貿易”，具有恢復和發展明朝與海外

各國的關係、同時進行海外貿易的“雙重任務”⁽⁸⁾，把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性質研究推向深入。60年代開始有學者就寶船的船型、尺度展開了討論，到1983年5月江西九江召開的鄭和航海學術討論會暨中國航海史研究會年會成為鄭和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圍繞寶船尺度的大小、船型是沙船還是福船展開爭鳴，尤其是工程學、航海學、海洋測繪學、天文學等學科開始涉及鄭和研究領域，拓寬和深化了鄭和研究中船舶、航海技術、航海圖等問題的研究。同時，對鄭和遺蹟的研究也更加具體，涉及大多數遺蹟。70年代後期至80年代初期，鄭和研究出現了小熱潮，研究鄭和的著述增多，出版了十部專門著作，這是以往鄭和研究不多見的。

第二階段（1985-2005）是鄭和研究繁榮、創新和全面發展階段。其間出現了研究活躍多元、多學科交叉融合、緊密聯繫現實的局面，形成兩個發展時期：

一、全面發展時期（1985-1997）

1985年全國紀念鄭和下西洋580週年的活動，肇啟了全國鄭和研究的熱潮，標誌着鄭和研究進入新的階段。鄭和研究適應國家改革開放及其不斷發展的形勢，顯示了歷史文化的應用價值，為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提供激勵和有益的借鑒。國家高度重視，參加鄭和研究的人數眾範圍廣，學術活動頻繁，成果豐碩。海內外先後召開十三次學術研討會，發表學術論文、文章八百多篇，出版各種學術著作、論文集、家譜、資料選編、航海圖等三十多部，並先後建立了南京鄭和研究會、昆明鄭和研究會等專門研究組織，創辦了《鄭和研究》刊物，鄭和研究體現了繼承與創新的面貌，開闢了新視角、新領域，研究涉及鄭和下西洋史實、鄭和航海與航海技術、鄭和人物及遺蹟、鄭和學術史、鄭和下西洋與現實關係等多方面，形成鄭和研究全面發展的局面。

重視鄭和下西洋的綜合性研究。如出版了鄭一鈞《論鄭和下西洋》等綜合性研究著作，對鄭和及下西洋從各個方面進行了較全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推動了對鄭和下西洋研究的深入。

鄭和研究與現實問題緊密結合。歷史與現實的結合，是這一時期鄭和研究的顯著特色，形成鄭和研究中一個新的領域。如1993年昆明召開的首屆鄭和研究國際會議，以“鄭和下西洋與當代中國的全面開放”為主題；1995年南京召開的紀念鄭和下西洋59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以“擴大開放，加速中國經濟國際化”為主題。根據此間出版的論文集和《鄭和研究》統計，前後發表了八十多篇論文、文章，分別從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國防建設、海洋事業、精神文明建設、國際關係、地方實際等方面進行研究，通過分析和總結鄭和下西洋的歷史經驗教訓為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

多學科合作研究。進入20世紀80年代的鄭和研究已不再限於歷史領域專題研究，涉及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中十多個學科門類，相互交叉、協作與融合，發揮各自的特點，使一些問題得到解決、深化。在多學科研究基礎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學者提出了建立“鄭和學”的觀點，就其內涵、體系、研究任務和方法等進行一定的探討。

這一時期的鄭和研究也開闢了一些新的研究領域，提出了許多新觀點。有學者從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互動性研究鄭和下西洋的原因；有從香料貿易研究鄭和下西洋的性質；有從思想文化角度分析鄭和下西洋的貢獻；有從海權的角度探討鄭和下西洋的動因、目的和作用；有從福建地緣特點來進一步考察與鄭和下西洋關係；有運用現代造船工程中搖擺性和振盪性原理論證鄭和寶船問題；也有從宗教信仰角度研究鄭和本人素質等等，成為20世紀鄭和研究領域最活躍的時期。

二、創新和高潮時期（1998-2005）

世紀之交的鄭和研究出現新的機遇，1998年國際海洋年為鄭和研究發展提供了契機，2001年4月中國政府正式決定紀念鄭和下西洋首航600週年，推動鄭和研究走向高潮。海內外先後舉行二十多次學術會議，一大批學術著作、論文集、傳記等書籍紛紛出版，發表論文、文章超過了千篇。

這一時期學術界重視對20世紀鄭和研究的總結。進入世紀之交和新世紀之初，陸續發表了一些

論文，通過全面而系統總結 20 世紀鄭和研究，分析鄭和研究的發展歷程、發展特點和發展規律，評述各種學術觀點，為進入新世紀的鄭研究和紀念鄭和下西洋 600 週年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動力，積極探索鄭和研究的未來發展方向，主張從世界範圍和人類文明進程，從中華民族復興和海洋文化的角度創新鄭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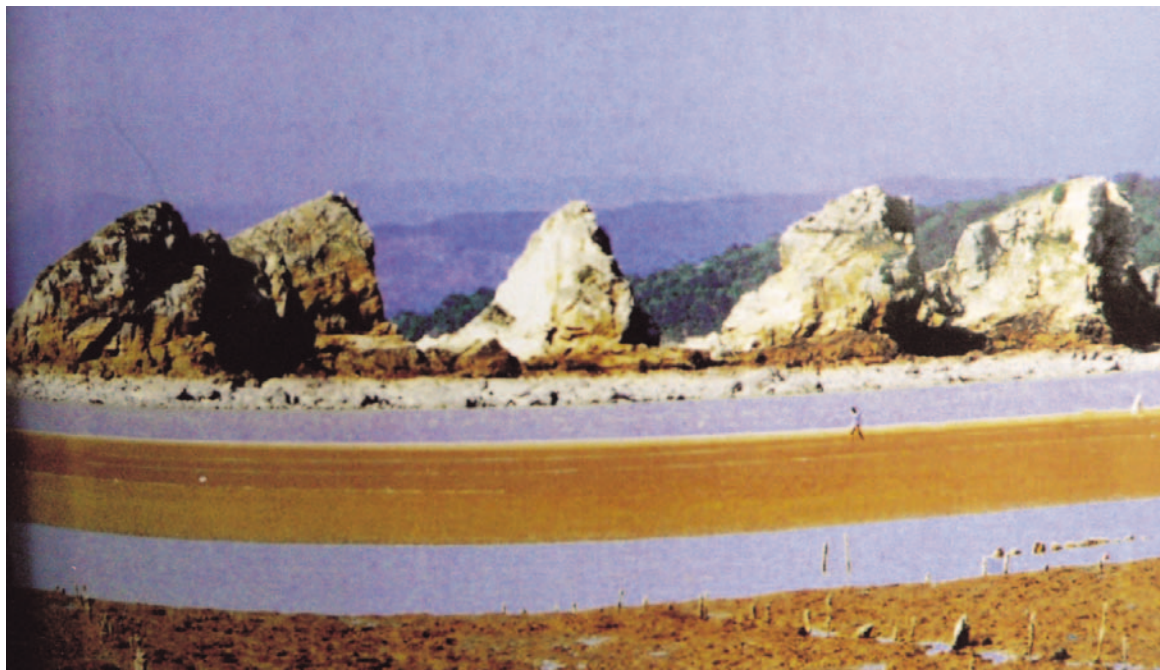
海內外圍繞英國學者加文·孟席斯觀點展開熱烈討論。2002 年 3 月，加文·孟席斯提出鄭和船隊先於哥倫布到達美洲大陸、先於麥哲倫完成環球航行的觀點，並於 11 月出版了《1421——中國發現世界》一書，在學術界和社會引起了熱烈討論。多數學者研究認為加文·孟席斯觀點主要是一種假設和推論，還缺乏文獻和考古證據；也有認為加文·孟席斯提供的一些線索和研究問題的方法有借鑒之處。這一問題的探討還在繼續，將超出加文·孟席斯研究的範疇，使人們從世界文化的多元互動性與

人類文明進程關係將研究深化和拓展。加文·孟席斯觀點產生的效果，客觀上擴大了鄭和及鄭研究在世界範圍的影響。

寶船研究和南京寶船廠遺址挖掘再次成為關注的熱點。20 世紀末迄今，在有關寶船的史料發掘、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取得新的進展。1999 年發現了刻於永樂十八年《太上說天妃救苦靈應經》卷首的鄭和下西洋船隊圖像。該圖是隨鄭和下西洋的僧人勝慧臨終時口述，由其弟子繪製，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同時圍繞寶船尺度及文獻記載資料展開爭鳴，有學者繼續堅持文獻記載，以明景泰辛未刊印的馬歡《瀛涯勝覽》版本證明《明史》等記載寶船資料是可信的；也有認為《明史》記載的鄭和寶船資料最早源於明末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南京靜海寺殘碑〉記載的“二千料海船”應該是鄭和下西洋最大的寶船。此間圍繞鄭和寶船研究陸續發表了近三十篇論文。還有研究冊封舟與寶船的關係、



鄭和七次下西洋航線圖



位於福建省閩江下游入海口的五虎礁。在《鄭和航海圖》中標為五虎山，是當年駐泊在長樂鄭和船隊每次伺風開洋出使各國必經水道的航海標誌。

寶船的用途等。南京寶船廠遺址的挖掘，出土了二千多件文物，其中包括舵杆、造船材料、造船工具等重要的實物資料，對寶船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重視從人類文明的歷史探討鄭和下西洋。新世紀之初，學術界結合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正在進行的偉大的民族復興事業，結合世界經濟走向一體化的趨勢，國際上強權政治和單邊主義突出，從人類文明的進程審視鄭和下西洋的偉大實踐，探討其凝聚和體現的和平、尊重、寬容、交流的人文精神和價值取向，駁斥“中國威脅論”，顯現了鄭和的文化價值和應用研究的特點。

王景弘的研究取得重要進展。近年學術界在王景弘史料發掘和考證取得進步，搞清王景弘的籍貫是福建漳平市赤水鎮香寮村，同時對王景弘在鄭和下西洋中主要助手作用、在航海技術方面擔負的主要角色等都給予重新認識和評價，出版了《明代大航海家王景弘》、《王景弘與鄭和下西洋》著作，前後發表六十多篇學術論文，成為近年來鄭和研究中一個亮點。

此外這一時期，在鄭和家世研究、鄭和下西洋對外關係上、鄭和下西洋地名考證等方面均取得新的研究成果，發現了一些新史料，如在葡萄牙史料中發現鄭和下西洋相關記載等；一些方志、族譜、家譜等也有新的記載發現。海外鄭和研究熱烈，在臺灣、香港、英國、新加坡等地召開了多次鄭和研究學術會議，並有臺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英國等鄭和研究學會陸續建立，發表了一些研究著述。

百年鄭和研究發展的主要特點

鄭和研究在百年發展進程中，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形成不同的特點，體現了不同的時代特徵。儘管各時期具有不同的特點，學術觀點、學科角度和研究方法也具有多元性質，但縱觀百年鄭和研究學術發展道路，筆者以為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鄭和研究始終與中國社會發展緊密結合，體現了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

鄭和研究在百年的發展中，從開端就烙上了時代的特徵。1905年，中國近代維新思想家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以“中國之新民”筆名發表了〈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他在國危民弱的時刻，對傳統的經世致用史觀進行新史學的洗禮，彰顯了鄭和研究所蘊含的鮮明時代特徵，目的是通過宣揚鄭和下西洋所展示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力，振奮民族精神，激發國民意識，拯救和改造國家。1918年，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在他用畢生精力設計的〈建國方略〉中，通過盛贊鄭和下西洋“超前軼後之奇舉”⁽⁹⁾，增強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號召國人戰勝困難，建設近代化的國家。1984年，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認真總結歷史經驗，用鄭和的開放精神，激勵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發展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90年代，江澤民結合中國擴大開放與世界經濟接軌的形勢，曾先後五次論述鄭和，闡述了交流與合作的時代意義。2001年4月，中央決定紀念鄭和下西洋600週年活動，制定“熱愛祖國，睦鄰友好，科學航海”十二字方針，賦予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和平、交流、合作、共同發展的時代精神。

百年的鄭和研究，始終與時代的需要緊密結合，充分體現出奮發救國—改革開放—交流合作—和平發展的時代精神特徵，折射鄭和下西洋所蘊含的與時俱進的愛國主義精神。這是百年鄭和研究體現的最主要特點，也是鄭和研究發展、繁榮的主要動力。

第二、鄭和研究逐漸從歷史領域中的專題研究向多學科交叉方向發展

以往的鄭和研究，鄭和下西洋是作為一個重要歷史事件和明初對外交往的內容，在歷史領域進行研究。到40年代，有學者開始運用自然科學中的一些原理來認識和研究鄭和下西洋的船舶、航海技術問題，提出了不同的觀點。50年代後期有學者結合航海學的原理研究鄭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動。60-70年代，學術界運用造船、航海學等科學原理研究鄭和寶船、航海及航海技術，從其它學科角度探討和解读鄭和研究中航海技術方面的內容，拓寬了人們研究的視角，出現了分學科和多學科研究的現象。

進入80年代初，鄭和研究領域多學科研究的局面進入一個新階段，其中以鄭和寶船研究為代表，形成現代科技派和文獻派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同時也有從學科交叉融合角度進行探索的。1985年後，鄭和研究形成了多學科研究的局面，不再單純的局限於歷史領域中的專題研究，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等多個學科相互結合、交叉，走向多學科的融合。

如有學者把歷史學與航海學、測繪學、地圖學等科學原理結合研究《鄭和航海圖》，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績，出版了《新編鄭和航海圖集》；有把文獻記載與航海學原理結合研究鄭和下西洋的航海技術，還有結合文獻學、考古學、船舶工程等學科研究鄭和寶船；有從宗教、民族學的角度探討鄭和宗教信仰及其在下西洋中的作用；有從航海醫學角度研究鄭和船隊航海活動；有從海洋學研究鄭和船隊對季風的運用；有從軍事學研究鄭和船隊的編制體制以及作用，等等。學科涉及歷史學、考古學、地理學、航海學、海洋學、天文學、工程學、文學、民族學、宗教學、哲學、經濟學、軍事學、心理學等學科。在多學科綜合研究的基礎上，1988年有學者提出建立“鄭和學”的倡議，此後到1993年間陸續發表四篇討論和論證“鄭和學”的論文，就其科學性、重要性和“鄭和學”的範疇、體系、特點、方法等進行了探討。鄭和研究在發展中形成的多學科交叉、綜合、融合的局面，需要學術界在總結多學科研究鄭和的基礎上，再進一步從交叉學科和學科融合的角度，探討建立“鄭和學”學科的科學內涵、理論體系、研究物件範圍、研究方法等。21世紀初，鄭和研究凸現鄭和下西洋文化價值和人文精神為主鄭和文化，重視探討歷史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應用價值。有學者提出，鄭和研究無論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或“鄭和學”交叉學科，都可以置於“鄭和文化”內涵之中，從寬泛的文化範疇探索鄭和研究的發展方向。

第三、鄭和研究逐漸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關注，呈現國際化趨勢

有關鄭和研究資料表明，早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就有外國學者從事鄭和研究。他們的研究要比

中國學者研究早三十年。最早有法國的麥耶兒斯（W. F. Meyers）在1874年在《中國評論》第三、四卷上發表〈15世紀中國人在印度洋的探險〉，介紹了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有關鄭和下西洋的史料，並就其中一些地名進行考證。19世紀80年代荷蘭的葛蘭威爾德（Groeneveldt）、英國的菲利浦斯（Phillips）也就鄭和航海圖及一些海外地名進行考證。20世紀早期，外國的研究學者增多，其中影響較大的有法國的伯希和、費琅、荷蘭的戴聞達克、日本的藤田豐八、桑原隲藏、山本達郎等。他們的研究對30-40年代的中國學者產生了重要影響。50-70年代，海外發表三十篇研究論文，也出版幾部著作，如日本寺田隆信《鄭和》等。進入80-90年代，國外對鄭和研究出版了幾部有影響的著作，日本的《鄭和——聯結中國與伊斯蘭教世界的航海家》、《大航海》、美國的《中國稱雄海洋時代》、法國的《啟蒙之龍，15世紀初葉明代的遠航》等，在南京、太倉、昆明、雅加達等地先後召開了七次學術研討會均有國外學者發表研究論文，收錄在每次會議的論文集。這些研究，主要是圍繞鄭和航海活動、海外地名考證、與海外國家的關係等，採用國外一些研究立場、方法，尤其是一些海外資料，補充了國內研究資料，促進了鄭和研究在國外的發展。2002年，英國學者加文·孟席斯提出了鄭和船隊先於哥倫布到達美洲大陸，並進行了環球航行的觀點，出版了《1421——中國發現世界》一書，引起了國際

學術界對鄭和的關注和研究。儘管學術界多數學者不同意加文·孟席斯的觀點，但客觀上這場爭鳴起到了宣傳、擴大和推動鄭和研究在國際上的影響。21世紀初，隨着中國與世界經濟文化交流的不斷深入，特別是中國政府決定紀念鄭和下西洋600週年活動，國際上重視和研究鄭和的學術著述、會議日漸增多，英國、美國、新加坡、印尼等國家還成立了鄭和研究會，鄭和研究的發展走向國際化，成為一門國際性學問，但還需要不斷進行交流和推動。

第四，鄭和研究具有顯著的地方特色

學者們將研究鄭和與江蘇、雲南、福建，與印尼、馬來西亞等緊密結合，出版了《鄭和與福建》、《鄭和與南京》、《鄭和與印尼》、《鄭和與馬來西亞》等一批研究成果，並有關於鄭和下西洋與東南亞和馬來西亞、麻六甲、印尼、泰國等地區的系列研究論文刊發。這些地區成為鄭和研究的重要基地。

第五，重視對鄭和研究發展的不斷總結

百年鄭和研究的發展，是伴隨着學術界對鄭和研究本身不斷地總結而前進的。80年代之前，學術界對鄭和研究的總結、綜述偶有所見，沒有專門著述。1983年以來，有關著述時見迭出，迄今發表了近六十篇論文和文章，成為鄭和研究領域中一個突出的特點。

這些總結和綜述，各具特色，分別體現某個時期鄭和研究的發展水準。它們有的對若干年鄭和研



複製明茅元儀《武備志》所收錄的〈鄭和航海圖〉（部分）

究發展狀況進行較全面地總結，如黃慧珍、薛金度的《鄭和研究八十年》、鄭一鈞《近年來鄭和研究述評》、范金民、時平的《新的里程，新的進展——鄭和研究十年綜述》等；有的對某一地區或海外的鄭和研究進行總結，如邱克〈國外對於鄭和下西洋的研究〉、蔡鴻生〈蘇聯關於鄭和下西洋的研究〉、程昕、汪宏昌《十年來雲南鄭和研究述評》等；有的對某一年進行總結，如鄭一鈞的1985-1986年、1987年、1988年、1989年、1996-1997年等進行的〈鄭和研究論著述評〉等；有的對某一次學術會議進行綜述，如馬興東〈昆明首屆鄭和研究國際會議討論綜述〉、時平、范金民〈紀念鄭和下西洋59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等；有的對鄭和研究的某一方面進行綜述，如楊新華〈鄭和世系綜述〉、時平〈十年來有關鄭和軍事問題的研究〉、朱鑒秋《鄭和寶船尺度研究綜述》等。這些總結及時反映了鄭和研究的進展和學術前沿，擴大交流，對推動鄭和研究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其中，黃慧珍、薛金度的《鄭和研究八十年》在鄭和研究學術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為後來學者總結20世紀的鄭和研究奠定了基礎。在21世紀初，有學者對整個20世紀或近百年的鄭和研究，如羅宗真的〈中國遠航世界的創舉——20世紀鄭和研究之回顧〉、時平〈近百年的鄭和研究〉、范金民〈20世紀的鄭和下西洋研究〉，進行了大縱深的回顧、梳理和總結，注重鄭和研究發展階段劃分、各種學術觀

點的歸納、學術成果的介紹等。

百年鄭和研究還有其它一些特點，如比較研究也是百年鄭和研究中一個重要特點，發表了一大批學術論文。

百年鄭和研究的基本問題

鄭和研究的內容及範圍，伴隨着鄭和研究的百年發展逐步豐富和擴大，不同的學者、不同的角度和方式有不同的概括。本文認為百年鄭和研究所涉及的問題主要包含了鄭和下西洋史實、鄭和航海與航海技術、相關人物及遺蹟、鄭和研究學術史、鄭和下西洋與現實關係等五個方面。

鄭和下西洋史實研究主要包括：鄭和下西洋的時代、歷史地位、目的、性質、終止原因，鄭和下西洋相關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問題，對外關係，文學等問題。

鄭和航海與航海技術研究主要包括：鄭和下西洋航海活動，船舶和船隊，航海技術，海洋科學等問題。

相關人物及遺蹟研究主要包括：鄭和的身世和家世，鄭和的宗教信仰，有關鄭和遺跡，相關人物等問題。

鄭和研究學術史主要包括：鄭和研究發展評述，鄭和文獻研究，鄭和學科體系研究，鄭和研究方法等問題。



（圖接左頁）

鄭和研究與現實關係的研究主要包括：鄭和下西洋與國家改革開放、經濟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與航海和海洋問題，與國防安全，與國際關係等現實問題，以及與一些相關地方實際問題等。

若把鄭和研究與現實關係的研究作為一個研究方向，那麼百年鄭和研究的內容可以基本上概括為五個方面十七個研究方向，其下是第三級所包括的比較具體的問題，限於篇幅不進一步展開。這裡祇簡要介紹百年鄭和研究中若干主要爭鳴的問題。

第一、關於鄭和下西洋的目的

有關鄭和下西洋目的，是鄭和研究中討論最熱烈、持續時間最長的一個引人關注的問題。《明史·鄭和傳》記載鄭和下西洋的目的，“蹤跡建文”，“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30年代中期學術界曾圍繞這一問題展開討論，爭鳴雙方都以文獻資料為依據，一種觀點認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經濟目的，通過國際貿易來解決國內經濟問題。另一種觀點認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蹤跡建文、宣揚國威。

50年代學術界又展開熱烈討論，除了堅持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基於政治上的蹤跡建文和耀兵異域觀點外，有學者提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針對中亞蒙古帖木兒帝國對明朝西北威脅的觀點；還有認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明朝積極推行“朝貢貿易”和“齎賜貿易”，具有恢復和發展明朝與海外各國的關係，同時進行海外貿易的“雙重任務”。80、90年代，這一問題成為鄭和研究領域中重要問題之一，一些學者運用新的研究方法，或從某一視角進行探討，如從明初國內對藥材的需求激增，或從明初鞏固海防的需要，或從中國海權發展的角度等，拓寬和深化了研究。迄今為止，關於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共有“蹤跡建文”、“耀兵異域”、“針對帖木兒帝國而發”、“建立回教同盟”、經濟動因為主、政治動因、政治經濟雙重目的、發展海權、震懾倭寇和文化交流等觀點。其中主要爭論圍繞是經濟動因為主，還是政治動因為主，或兼有政治和經濟雙重性質？鄭和下西洋是集中國家力量實施大規模對外行



在馬來西亞麻六甲市當年鄭和船隊建立官廠的遺址中發掘的瓷片

動，前後七次，歷經二十八年，先後訪問了亞非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因此它不會單純祇有一個目的。從文獻記載、從明初社會的形勢、從朱棣個人因素以及從當時的國際形勢和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看，同時考察鄭和下西洋活動的具體內容，結合百年來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可以認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有三個：政治上恢復和擴大朝貢貿易；經濟上進行海外貿易；維護海上安全和對帖木兒帝國勢力威脅進行戰略牽制。鄭和下西洋目的，無論從政治層面、經濟層面、軍事層面來分析，試圖把中國的穩定與發展同周邊形勢聯繫起來，想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和平局面，提高明王朝的國際威望，實現理想的封建“大一統”，達到“天下一家”的局面。

第二、關於鄭和寶船尺度和船型

有關鄭和寶船的研究，自20世紀40年代有學者提出質疑，至今爭鳴近七十年。80年代初期掀起了高潮，史學和考古研究者、造船和航海等專業人員分別以文獻、文物和造船原理等為依據進行研究，基本肯定了《明史》的記載，認同船型以福船型為主，同時不否定鄭和船隊有沙船型的寶船。另一種觀點從造船原理、航行要求和明代製造能力等提出質疑，不同意文獻記載的寶船尺度。目前圍繞寶船的主要爭論，一是寶船的尺度、寶船與兩千料海船的關係；二是寶船的船型。前者是寶船研究中爭鳴的主要問題。一種觀點認為歷史文獻記載寶船長44丈、寬18丈是可信的，二千料船是鄭和下西洋船舶中的一種；另一種觀點認為文獻記載的寶船尺寸是錯誤的，南京靜海寺殘碑記載的二千料船應是鄭和下西洋所乘的寶船。關於寶船船型，多數學者認為寶船主要是尖底的福船型，不否認有沙船型的存在；還有少數學者堅持寶船屬於沙船型。有關鄭和寶船的討論還將繼續。

第三、關於鄭和身世和家世

這是百年鄭和研究中一個重要內容和討論的熱點。此前由於歷史文獻記載有關鄭和身世及家世寥寥，所以研究十分有限。20世紀初十年，有學者在鄭和故里發現鄭和父親〈故馬公墓誌銘〉，始對鄭和家世有了進一步的瞭解。30年代中期，在鄭和家世



明代紡織品藍地纏狀花

的研究上取得重要進展，1936年在雲南發現《鄭和家譜》抄本，1937年李士厚先生出版了《鄭和家譜考釋》。1983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宮發現一份〈鄭氏家譜首序〉，更多地揭開鄭和的身世情況。1985年出版了黃慧珍、薛金度編《鄭和家世資料》。2005年出版《鄭和家世資料彙編》。迄今圍繞鄭和身世和家世研究主要爭論有三個問題：

一是鄭和是否是元朝賽典赤·瞻思丁的後裔。40年代彭嘉霖考證出鄭和是元代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咸陽王賽典赤·瞻思丁的後裔。80-90年代，有學者又根據發現的《賽氏總族牒》《賽典赤家譜》和《馬氏家乘》資料，與〈故馬公墓誌銘〉、〈鄭氏家譜首序〉等原有鄭和譜系資料考證，認為世系存在多處差錯，對鄭和是賽典赤·瞻思丁的後裔觀點提出商榷。不少學者進行研究和考證，堅持鄭和是賽典赤·瞻思丁後裔的觀點。21世紀初期，鄭和家世研究又取得新的進展，認為鄭和為避諱父親米里金世襲元朝滇陽侯，參加元梁王組織抵抗抗軍作戰而死，所以〈故馬公墓誌銘〉不提名字、卒年和死因。學術界從記載賽典赤·瞻思丁和鄭和世系的譜牒入手，進行考證研究，推動了鄭和研究。

二是鄭和賜姓問題。一種觀點依據《鄭氏家譜首序》的記載，“公和始事於永樂二年（1404）正月



印尼中爪哇省三寶瓏市三保廟。當地人修建，常年拜祭三保大人鄭和。

初一，御書鄭字，賜以為姓，乃名鄭和”，又提到“鄭州”一役建功。其它文獻如《國榷》《明通鑑》均提到靖難之役朱棣鄭村壩之戰獲勝。所以有學者研究家譜之中的鄭州是鄭村壩之誤。所以因是役鄭和被賜“鄭”姓。一種觀點提出疑義，認為《鄭氏家譜首序》記載有誤，而且記載靖難之役的史料中均沒有提及是役和鄭和。賜姓問題顯然沒有全部釋疑。

三是鄭和生卒年問題。關於鄭和出生和死的時間，歷史文獻沒有明確記載。30年代吳晗最早根據相關資料綜合分析，認為鄭和生於洪武四年（1371），後為不少學者讚同和沿用。還有提出是洪武六年（1373）、洪武七年（1374）、洪武八年（1375）等說法。鄭和的卒年，吳晗認為是1435年。1983年鄭一鈞根據發現的〈非幻庵香火聖像記〉，認為1433年鄭和卒於印度古里，被學術界多數採信。

第四、關於鄭和的宗教信仰

有關鄭和的宗教信仰，前期鮮有研究。20世紀50年代，有學者研究鄭和與天妃的關係，稍後也有研究涉及鄭和與回族的關係。80年代學術界開始專門研究鄭和的宗教信仰問題，後來有學者專門研究鄭和下西洋與天妃、鄭和崇佛、鄭和下西洋與東南亞伊斯蘭教傳播等，出現鄭和信仰佛教說、信仰道教（天妃信仰）說、信仰伊斯蘭教說和兼信說。

信仰佛教的觀點認為：一是有史料明確記載鄭和自稱為“奉佛信官”⁽¹⁰⁾，並有法名；二是鄭和曾施財印造佛經分送各大禪寺；三是鄭和下西洋時佈施國外佛寺，並帶回佛陶；四是鄭和成人後身邊從皇帝到官員、宦官都崇佛的影響等。

信奉道教的觀點認為：一是鄭和航海活動、船員與天妃有密切的關係，在航海前後、航程中都祭拜天妃；二是當時鄭和所立的永樂十四年四月初六

日〈御製弘仁普濟天妃宮之碑〉、宣德六年歲次辛亥春朔〈通番事蹟之記碑〉、宣德六年歲次辛亥仲冬吉日〈天妃靈應之記碑〉；三是鄭和曾奏請修建、捐資修建一些天妃宮；四是永樂、宣德皇帝多次加封天妃，遣使祭拜天妃；四是有史料記載天妃救助鄭和船隊的故事。學者們在論述鄭和信奉道教時，不否定他兼信它教。值得注意的是，有學者提出天妃信仰屬於我國沿海的民間信仰，不應作為道教內容。

信奉伊斯蘭教的觀點認為：一是鄭和出身穆斯林回族家庭，自幼就信奉伊斯蘭教；二是鄭和曾在泉州回教先賢墓行香，在清真寺祈禱；三是鄭和奏請重修南京淨覺寺等；四是鄭和船隊中吸收了一些穆斯林成員參加；五是有海外文獻記載鄭和在印尼傳播伊斯蘭教等。認為鄭和信仰伊斯蘭教，奉佛崇道祇是表現為了適應環境和完成下西洋的使命。

兼信說考察鄭和信仰的軌迹、身份和中國文化特點，認為鄭和兼信佛教、道教和伊斯蘭教。

第五、關於鄭和航海活動範圍及地名考證

有關鄭和航海活動的範圍及地名，在百年鄭和研究中從開始就是學者研究的重要內容。早期重點放在每次航海的時間、抵達的國家、地名及考證、《鄭和航海圖》等，尤其是南洋的地名。20世紀50年代後，研究南亞、西亞和非洲國家考證增多，搞清海外不少地方。80年代《新編鄭和航海圖》集以

往研究的成果，基本確定了鄭和航海活動的範圍和地名，但存在一些有爭論的觀點。

有關鄭和使日問題。1982年，有學者根據明鄭舜功《日本一覽》、胡宗憲《籌海圖編》和清傅維麟《明書》等文獻的記載，提出鄭和在下西洋前夕，於永樂二年曾出使日本的觀點。也有學者不同意此觀點，認為還缺少直接的證據，史料記載多明代中後期。日本學者多數認為鄭和使日還缺少證據。

有關鄭和船隊是否到過菲律賓問題。《鄭和航海圖》其它文獻沒有記載鄭和下西洋曾到達菲律賓。外國學者奚爾恩在《遠東史》中記載1405年七八月間鄭和率船隊訪問菲律賓，然後到占婆（即占城）。60年代有學者提出鄭和船隊到過菲律賓。以後學術界一種觀點認為鄭和船隊在往返時有可能經過菲律賓，或有分鯨訪問過菲律賓；一種觀點認為還缺乏直接的證據，表示質疑。

有關鄭和船隊是否到過澳洲問題。20世紀50年代，有學者研究提出鄭和船隊可能到達澳大利亞，此後有學者進一步深入研究，一種觀點認為鄭和船隊或分鯨抵達過澳洲。主要依據：一是《鄭和航海圖》中蘇門答刺島下面畫有一片陸地，一條航線從其左端繞過，有學者解讀《鄭和航海圖》時，認為此塊陸地是澳洲北部大陸；二是1879年在澳洲西北達爾文港出土一尊中國壽星石像；三是鄭和船隊多次

訪問爪哇等地，這裡距離香料產地近，離澳洲大陸也近，從航程和技術上都具有可能性。另一種觀點認為，《鄭和航海圖》吸收了宋元時期對澳洲的認識，以海圖形式表達出來，沒有確鑿證據可以證明鄭和船隊到達過澳洲。

有關鄭和船隊是否到達好望角問題。鄭和船隊到達非洲東岸是無可置疑。最南端到達哪裡存在不同的研究結論。一種觀點認



◁麻六甲市三寶山，當年鄭和船隊官兵曾經駐紮的地方

為鄭和船隊沒有到達好望角。通過對《鄭和航海圖》和文獻記載的研究、考證沒有證明，20世紀80年代後，有學者通過進一步考證，認為麻林地是今基爾瓦西瓦尼，比刺和孫刺是南緯 15°4' 的莫三比克港和南緯 20°12' 的索法拉，是鄭和下西洋到達非洲最南的地方；另一種觀點認為鄭和船隊曾到達過好望角。一是根據地圖學家弗拉·毛羅於 1459 年繪製的世界地圖上的註文記載；二是《鄭和航海圖》在馬達加斯加島位置標有一條不完全的向西南的航線；三是有從東非語言結合地名研究，認為非洲東岸有幾處均叫麻林地的地方，其中一處在南非境內，鄭和船隊抵達的麻林地可能是該地；四是早在元朝時期中國使者就訪問過馬達加斯加。因此，鄭和船隊或分鯨存在有可能抵達好望角。

有關鄭和是否到過臺灣問題。20 世紀 50 年代有學者研究鄭和與臺灣問題，60-70 年代介紹和研究著述顯著增加，涉及鄭和鳳山植薑、淡水投藥、赤嵌汲水、鄭和及其他人員來臺灣的可能性、鄭和到過澎湖等。一種觀點依據何喬遠《名山藏》、張燮《東西洋考》、俞正燮《癸巳類稿》、龔柴《臺灣小志》、吳振臣《閩遊偶記》、蔣毓英《臺灣府志》、連橫《臺灣通史》等文獻，研究認為鄭和或王景弘曾到過臺灣；一種觀點認為，鄭和到過臺灣值得商榷，還缺少直接的證據。

另圍繞鄭和航海活動和地名考證，還有東西洋、赤嵌等考證、永樂元年鄭和是否出使暹羅、鄭和是否到過天方等也存在不同的觀點。

第六、關於鄭和下西洋對外關係問題

鄭和下西洋對外關係涉及多方面，這裡主要介紹主要爭論問題。1) 對明初海禁政策與鄭和下西洋的關係。一種觀點認為，洪武時期執行的海禁政策，限制與海外的交往，永樂時期針對形勢的變化，實行的是寬禁政策，鄭和下西洋就是這一政策的體現。另一種觀點認為，永樂時期執行的是與洪武時期一致的海禁政策，嚴禁民間航海活動，不限制官方的航海，鄭和下西洋是擴大官方航海活動，從而進一步打擊民間航海活動。2) 對朝貢貿易不同認識。一種觀點認為，鄭和下西洋是為了朝貢貿



位於泉州市東郊靈山回教先賢墓迴廊的鄭和行香碑
鄭和於永樂十五年（1417）第五次下西洋前夕到此行香
（碑高 1 米寬 0.42 米 碑文楷書陰文）

易，限制和打擊民間貿易；另一種觀點認為，鄭和下西洋包括了政治意義上的朝貢貿易形式，也有經濟行為的官方貿易和一定程度的民間貿易形式。3) 鄭和下西洋對海外華僑的影響：一種觀點認為，鄭和下西洋促進了海外華僑的發展，是開創南洋華僑發展的新時代；另一種觀點認為，鄭和下西洋是堅決執行明初的海禁政策，限制和打擊了海外華僑事業的發展。

第七、關於鄭和海權研究中一段主要史料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學術界開始探討鄭和海權問題，伴隨研究的深入，形成不同的認識和觀點。一種認為鄭和時代沒有海權，一種認為存在

中國海權，是中國古代海權的鼎盛。其中爭鳴最熱烈的是鄭和為說明明仁宗朱高熾保留下西洋船隊時講的話，“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海，危險亦來自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我國船隊戰無不勝，可用之擴大經商，制服異域，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

⁽¹¹⁾ 此話是《論鄭和下西洋》引自法國學者弗朗索瓦·德勃雷著、趙鵬喜譯《海外華人》一書。一種觀點認為法國學者沒有引言出處，對這段話真實性、可信性表示質疑，不同意作為可信的史料；一種觀點同意使用，認為鄭和史料在海外有可能存在，認為它是鄭和長時期大規模經略海洋實踐的總結。爭鳴還在繼續。

第八、關於鄭和下西洋給明政府造成的經濟影響

有關鄭和下西洋給明政府造成的經濟影響，是百年鄭和研究中一個爭論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爭論與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對朝貢貿易的認識和鄭和下

西洋的評價有直接關係。一種觀點認為鄭和下西洋是厚往薄來的朝貢貿易，造成明朝財政嚴重負擔，“庫藏為虛”，最終被迫停止下西洋；另有學者研究認為，鄭和下西洋給明政府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也起到了促進作用。有關這一問題，還需要從經濟角度進行具體研究，得出研究的結論。

第九、關於鄭和研究的學術活動與現實中經貿關係

隨着20世紀80年代國家的改革開放形勢及其不斷發展，鄭和研究與現實社會需要聯繫更加緊密，在一些地區、行業出現了鄭和研究與社會經濟發展相結合的現象，這是鄭和研究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實質上是歷史與現實、文化與經濟的關係問題。在兩者結合的實踐中出現了不同結果，也形成不同的認識。一種觀點認為，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影響了鄭和研究學術本身，形成本末倒置，



位於南京牛首山南麓的鄭和墓

並不足取；一種觀點認為，這是鄭和研究的新發展，是歷史為現實服務、文化與經濟的結合，必然相互促進，有利於鄭和研究的發展。

此外，百年鄭和研究中還有一些爭論的問題，如寶船廠遺址和龍江寶船廠遺址的關係，是否是劉大夏焚燬鄭和出使水程檔案，第五次下西洋是否從泉州起航，如何評價錫蘭戰役和處理蘇幹刺事件，鄭和究竟到過多少國家，航海中“更”的里程計算等，有待深入討論和研究。

鄭和研究發展的思考

總結百年鄭和研究的意義，不單純的是對過去的發展及成果進行評述，更重要的價值是對鄭和研究未來發展的探索。百年鄭和研究發展形成的最寶貴經驗之一，鄭和研究始終與中國社會的發展緊密結合，從凝聚的中華文化中折射出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它是鄭和研究不斷發展的動力。因此，鄭和研究要與新世紀的中國社會發展相結合，加強鄭和研究中應用性研究，重視鄭和文化的應用價值，把鄭和下西洋蘊含的和平、交流、尊重和寬容的優秀民族品德，充份體現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與世界廣泛交流合作的進程中，展示和平、交流、合作和共同發展的新時代特徵。

鄭和是公認的世界歷史文化名人，鄭和下西洋是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成果，已經成為一門具有一定影響的國際學問。因此鄭和研究要重視從人類文明史的視角總結鄭和下西洋的文化價值及其人文精神，探討它從區域文明向世界文明轉換過程中的特點及作用，為人類文明的進步和世界一體化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進一步推動鄭和研究繼續向國際化方向發展。

新世紀的鄭和研究要在百年研究的基礎上繼承和創新。一是重視地方、尤其是海外有關鄭和研究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對已發現的一些新史料進行考證和辨析，搞清史料的真實價值；二是對鄭和研究中長期爭論的主要問題，除了繼續討論方式外，多從求同的角度探討，在沒有新的證據情況下，有些

問題可以暫時擱置，加強對鄭和下西洋船隊組織、管理和航海活動的研究；三是重視鄭和下西洋中外交往和文化交流的研究，多從交流的互動性探討文化交流對東西方、對人類文明的推動及影響；四是多學科的交叉、協作研究，應加強研究過程中的融合，內容的有機結合，從融合研究的基礎上得出結論，減少概念上、形式上的“融合”，可以運用新的方法、新的理論進行研究；五是鄭和研究應多研究其結果和影響，不必過份探討其動機。結果和影響有目共睹，輝煌可以發揮激勵的功用，轉折可以提供思考和借鑒，至今鄭和在海外一些地方還有積極的影響，至今我們還蒙受其利，值得重視。

歷史是變化的，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責任，形成每一代人的認識。走過百年的鄭和研究，在新世紀面臨新的機遇，鄭和研究領域需要用一些新理論、新方法來研究，更需要我們一代代不懈的努力，推進鄭和研究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

【註】

- (1) 黃慧珍、薛金度〈鄭和研究八十年〉，《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時平〈近百年的鄭和研究〉，《回族研究》2003年第一期；范金民〈20世紀的鄭和下西洋研究〉，《九州學林》2004年秋季刊總第五期。
- (2) 學術成果的數字統計，依據《鄭和研究資料選編》附錄〈八十年來國內外關於鄭和研究的論著目錄〉，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
- (3) 黃慧珍、薛金度上揭文，頁9。
- (4) 管勁丞〈鄭和下西洋的船〉，《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頁269。
- (5) 范文濤〈《鄭和航海圖》地名考釋〉，《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頁217。
- (6) 另有鄭鶴聲、鄭一鈞編《鄭和下西洋資料彙編》（下冊），齊魯出版社1989年出版。
- (7) 潘群〈鄭和使日問題初探〉，《文史哲》1982年第三期。
- (8) 韓振華〈論鄭和下西洋的性質〉，《廈門大學學報》，1958年第一期；陳得芝〈試論鄭和下“西洋”的雙重任務〉，《歷史教學問題》1959年第三期。
- (9) 《孫中山全集》第六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頁188。
- (10) 鄧之誠《骨董瑣記全編·骨董三記卷六·鄭和印造大藏經》。
- (11) (法) 弗朗索瓦·德勃雷著、趙鵬喜譯《海外華人》序，新華出版社1982年版。